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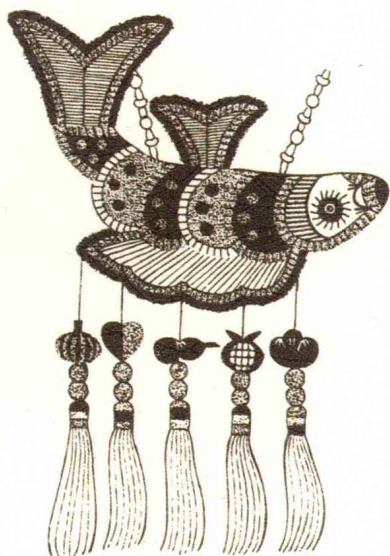
晚钟

wan

出谷

wanzhongchugu

● 陈福桐 ●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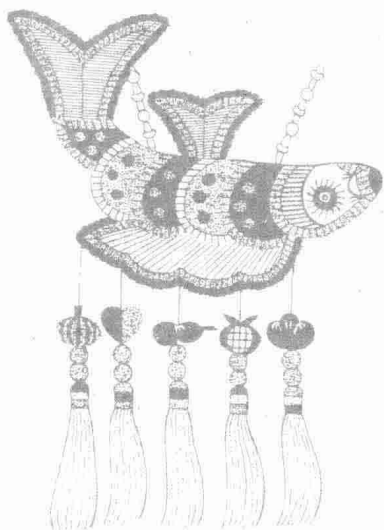
晚钟

wan

出谷

wanzhongchugu

●陈福桐●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晚钟出谷/陈福桐著. — 贵阳: 贵州教育出版社,
2009. 4

(我的贵州丛书)

ISBN 978—7—80650—227—3

I. 晚… II. 陈… III. 文史资料—研究—贵州省
IV. K297. 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37088 号

晚钟出谷

陈福桐 著

出版发行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教育出版社

地 址 贵阳市黄山冲路 18 号 A 栋

(电话 0851—8654672 邮编 550004)

印 刷 贵州兴隆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90mm×1240mm 1/32

印张字数 10.875 印张 260 千字

版次印次 2009 年 4 月第 1 版 200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650—227—3/K·29 定价:26.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厂址:贵阳市金丰路 5 号 电话:0851—6774152 邮编:550004

书 前 语

“晚钟出谷”一语，出自郑珍先生《巢经巢诗钞》中。我已九十三岁，两眼昏蒙，因省文史研究馆主事和馆友们的鼓励，将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为时而作的一些文章根据篇幅的要求拣出来整理出来，得贵州教育出版社的审订，同馆友人王尧礼老弟的校阅，这本主要谈贵州文化的册子得以面世。

我的祖先是从江西迁入贵州的。我生于斯长于斯，对乡土有很深的感情。近三十年又因从事一些文化活动，加深了对乡土的认识与热爱。贵州各族的先辈艰辛地创造了许多珍贵的精神财富，遗金满地，我才多少拾得一点，而年已入日薄西山之境，“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诉之笔端，成此一册，留下人生一段痕迹，请阅者指教。

陈福桐

2009 年元月

目 录

CONTENTS

- 我的童年/1
朱穆伯先生二三事/14
国民党贵阳鸭子塘监狱/22
我认识的三位贵州辛亥老人/31
不战投明的国民党八将军/36
迎接遵义解放纪事/44
黎平土改/62
寄哀思于涂月僧先生/69
- 和谐社会应建立新的伦理道德观/77
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82
贵州六百年的诗、志、禅/92
黔诗五百年储灵孕秀的因果探索/100
从贵州历史文化的多元化特色与“贵州学”/107
六千举人 七百进士/117
周渔璜与北京永乐大钟/124
封疆大吏的典范丁宝桢/127
黎庶昌——贵州放眼看世界的第一人/136
李端棻支持维新变法的光辉言行/148
尹珍千古犹馨香/157
《遵义史话》序/162
《燕窝人诗文集》序/166
《寸草心》读后随笔/169

- 《周西成与桐梓系军政集团史话》序/173
- 《贵阳人文读本》序/177
- 《明清六百年入黔官员》序/181
- 《周渔璜周钟瑄研究专辑》前言/185
- 安顺一凤/188
- 诗说湄潭/192
- 大白黔中兴替事
- 刘学洙《贵州开发史话》简说/196
- 异彩纷呈多元共生的贵州文化
- 史继忠《贵州文化解读》读后/201
- 高度重视农村人口问题和民主进程
- 兼述贵州历史与现实/206
- 装点贵州自然人文景观片思/214
- 从哲学政治军事多方面认识王阳明全人/221
- 禹门寺与丈雪和尚/233
- 赤松和尚的启示/238
- 杨氏入播二十九代的统治者/244
- 恢复文史馆 创修地方志/254
- 在外国出版的《地方志考稿》/259
- 修志从业十题/264
- 三农、乡镇应列入第二轮修志的篇章/304
- 回眸贵州修志/306

CONTENTS

目 录

- 珠玑满目是风流
——读《永济县志》札记/310
- 《沙滩文化志》前言/318
- 《贵州文史论丛》序/322
- 《贵州佛教史》序/324
- 《黔灵山志》点校本编后记/328
- 重印郑珍《荔波县志稿》序/331
- 《闲叟诗存》序/333
- 《乐家大院百年风云》序/340

我的童年

发蒙读书

我家附近有一座玉皇观，旁边是一间小学，后来叫丰乐小学，清代是湘川书院。隔墙是学宫，祀孔子，又叫文庙。因为在凤凰山和文昌宫之间有一座祀孔子的文庙，民国年间就把城外的这座文庙改为武庙，祀关羽，叫壮缪侯；又祀岳飞，叫武穆侯。一块金牌上书关岳二人的官称，所以孔庙由此变为关岳庙了。

按文庙的建筑规格，红色的宫墙，半月形泮池，巍峨的大成殿，“金声”、“玉振”两道旁门通后院，合抱的苍松挺立在大院中。门外行人大道边有石碑，大书“文武官员到此下马”八个大字，真是“大哉孔子何巍巍”。每年春秋两次祭庙，县长和绅士半夜入庙行礼，敲编钟，杀牛羊猪，隆隆鼓声，熊熊大火，一片庄严肃穆气势，令我们还没有发蒙读书的小孩子站在一旁，既惊讶，又呆呆地当作难逢的热闹场面那样观赏。

大概是民国十一二年间，我已经是六七岁了，家里没有送我读小学，而是送我去读私塾。教书先生姓吴，在小小的塾馆中坐有十来个孩子。我读的是《三字经》和《三字幼仪》，要读熟到“倒背如流”，至今还记得《三字幼仪》上有一段说不孝父母的人死后，在地狱中遭受“铁狗把你的肠子拖。肠子拖，受苦刑，世世不得变人形”的处罚。有一天半夜，父亲梦见东岳庙第一殿（秦广大王）派无常二爷来对他说，你的阳寿快到终了，因为你存心行善，自己去“悔愿”准以“延寿”。第二天同我母亲商量，就带着我和二弟，拿起一只鸡和一壶酒，还有香蜡纸烛，就在无常二爷塑像下去“许愿”。每年正月初十生日，父亲照此例来“还愿”。无常二爷旁边站有一个鸡脚神，也顺便为他烧香、敬酒，用鸡血抹他的舌头，求他们在阎王面前说句好话。这样的荒唐事做了好几年，直到我十二岁读小学五年级后才停止。父亲是城市平民出身，又爱劳动，身体也好，活到1960年所谓“自然灾害”时饿死的。

吴先生还教读过《大学》《中庸》，必须背书。记得有一夜坐在桐油灯下，母亲守着我读到“诗云，邦畿千里，维民所止。诗云，缙蛮黄鸟，止于丘隅。子曰，于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鸟乎”一段，硬是背不得，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已快二更时分，母亲不识字，无可奈何地才叫我去睡觉。

大概是十岁时候，我到桃源山上申惠泉先生私塾去。先生和父亲是朋友，我叫他三伯伯。师兄申维翰，表兄李德渊（伯谦），还有二弟福庆和田庆昌，都是申三伯伯特别用心教导的学生。我读了《四书》全本和《千家诗》《幼学琼林》全本，选读了一些古文。还读《声律启蒙》，学做对子，从对两个字、三个字开始。申三伯伯能

写楷书，做寿序、祭文，也会做诗，自编一本《虚字会通解》，要我们手抄下来。父亲在鸭溪镇做生意，我学写信也按老规矩写“父亲大人膝下，跪禀者……”。塾馆每月的初一和十五两天要在“至圣先师”孔子位前行跪拜礼。我们还读《三民主义教科书》，对孙中山先生也很崇拜。民国十四年（1925年）三月二日孙中山逝世，遵义各界举行隆重的追悼会，街上扎了若干牌坊。游行队伍过街时，我们得放假下山去观礼，印象很深。那些时候，模模糊糊地就背熟了“主义是什么，是一种思想，一种信仰，和一种力量”，还模模糊糊地知道美国的民有、民治、民享就是孙中山的民族、民权、民生主义这样囫圇吞枣般的道理。孔子和孙中山的学说给我以一点影响，在童年时就想将来做个县长，实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星拱之”的清官。回家以后，读《三国演义》《说岳传》和《施公案》《彭公案》等小说，还悬起一张关公像（是从布匹上撕下来的商标广告），每天烧香鼎拜。

接触社会

为我和二伯父家三哥、四弟讲故事的，就是我家二伯父。他晚上躺在鸦片盘子边，我们先是坐在床沿上听讲妖魔鬼怪的故事，愈讲就愈觉得妖魔鬼怪就在帐子背后。窗外风响动，觉得一些更可怕的鬼怪要进帐子来。于是就上床挤在二伯父横靠当枕头的棉被两边。二伯父鸦片过瘾之后，故事也讲完。我不敢开门出去，就隔窗子叫：“母，我要回来！”母亲才掌着灯来带我。有时二弟在场，也一道回家。

到外祖父家去也是听这一类的故事。他讲“长毛匪”进城，关二爷手执长刀，站在三官楼前杀退“长毛”，

讲得血淋淋，令人惊恐。外祖父家的堂屋设有一个社稷坛，阴气森森。屋后是菜园。一到天晚，有鬼神降临之感。菜园不远是城隍庙，每年要唱会戏。有一次看川戏演《更氏上吊》，这个更氏不孝婆婆，城隍菩萨要处死她。忽从后院传来一声呼哨，演员化装的判官、无常二爷、鸡脚神和一群恶鬼，穿过站着看戏的人群向戏台上走去，锣鼓打得阴惨惨的，有的小孩吓得哭起来。鬼怪从我面前走过，一副狰狞面目，使我老来还记忆犹新。他们踏上楼梯，把更氏抓起，在颈上套起绳子，用竹竿支起示众：“更氏死了”！人群逐渐散去，然后放下更氏，抬到后台，当然又活了。

还在东岳庙戏台看川剧《杀子报》，一个妇人和一个和尚通奸，被儿子知道了，妇人与和尚同谋杀死了小儿子关保，事发后被开肠剖肚，又是血淋淋的场面。这都是最初接触社会在童年的脑子里留下的可怖阴影。

在遵义新旧两城之间有一条湘江，靠着老城这边的沙滩，是杀人的河沙坝，有的老人骂不孝的儿子时爱讲“你这个河沙坝砍脑壳的”。我看过背着斩条押上河沙坝的犯人。二伯父讲过一个故事：一次杀了十三个人，把尸体抬到附近康氏桥边的尼姑庵去停放。有某甲到某乙家去，某乙对某甲说，我准备十三个包子和十三炷香，谁敢把它拿去在每具死尸脚下放一个包子、插一炷香之后回来，送一两银子。某甲一拍胸膛说，我去。当某甲走到第十三个死尸前完成任务回头走时，忽听一声：“还有我呢？”吓得某甲跌跌仆仆的就跑。原来是某乙从另一条路先到了尼姑庵，故意做的恶作剧，见甲被吓跑，大喊：是我，不要跑。某甲早已魂飞魄散，以为鬼来追他，跑到乙家，推门进去，倒地便死了。

这些故事，我从来不肯当“龙门阵”摆给孩子们听。

回想九十年前社会景象如此，岂不令人掩卷三思。

人世场面

我家附近的玉皇观，是一座大寺庙。前面有张天师、财神爷、韦驮等塑像，上石级十几步是大院，有玉皇大帝塑像，再上一个大院是大雄宝殿，一尊高大而庄严的全身佛像和两旁的十八罗汉，把这座宽大的佛殿衬得肃穆壮观。侧面有一间客房，供观音像。后面是方丈卧室。“禅房花木深”，一座花园也是我常玩耍的地方。方丈是街坊骆家的儿子，人们叫他骆师爷，出街穿上袈裟，目不斜视，简直像个高僧方丈。想不到他云游归来，还了俗，穿上西装，见着我时说：“去日儿童皆长大。”解放以后，我担任遵义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副主席，骆师爷来找我要个尽义务的工作，他已叫做骆镜涵了。后来有个方丈叫圆定，我和他成了熟人，圆定论学问远不如镜涵，但他善于交际，还资助一些穷苦青年上中学。至今这个佛道共处的庙宇已不存在，但它留给我的影响和感受却是深远的。

街上人家办丧事，多请玉皇观和尚来做法事，叫“放焰口”，用几张大桌子搭成两层法坛，七八个和尚坐在法师两旁，敲打乐器，唱和经文。节奏合拍，梵音古乐，响彻街头，非常悦耳。也可想见汽车未通时的街坊情景，宛如一个大杂院般的乐趣。也有请道士做“道场”的。还有一种叫做儒教的法师，大体和道士一样活动。街坊每年还有“清醮”集会，家家都要出钱交会首承办。开场锣鼓一响，就是五六天的道场。说起来是祭水火神、痘神，求一方平安，却又是集会娱乐一样的，男女老少热闹几天。有的稍微富裕的人家有“庆坛”活动。我家住新

城之南，所以庆的是南坛。这是巫教的活动，到南坛把一个石制的坛墩“请回”到家。巫师在前，由两个人抬坛墩进屋。这个法事是一天半，有两三场重要法事：一是轩辕黄帝和蚩尤作战以后，有蚩头和幺妹跳庆丰收和庆太平的舞蹈，还记得蚩头唱的“梭呀梭，听我蚩头唱个到底歌：我家有个蹩脚跛脚狗，踩着你家蹩脚跛脚鸡；你家有个蹩脚跛脚狗，踩着我家的蹩脚跛脚鸡，问你幺妹依呀不依。”法师姓白，也是唱蚩头的角色。这就是今天讲的雉戏。唱戏时，主人家要撒粑果，发赏钱。半夜有一场“伐五猖”的法式，巫师率领他的教友前往附近僻静角落去捉拿魔鬼，这些魔鬼原来用纸扎的，捉来烧了，清宅平安。快天亮时有一场由幺妹“砍红山”的法事，男扮女装的巫婆要来“送神”，向坛墩献酒，自己也喝酒。在法事过程中用小刀划破额前血管，血流在钱纸上，越红越好。一部分放在酒坛上，一部分交主人家，领赏。就是“坐三洞”的轩辕黄帝等也要用白皮纸按在涂有油彩的脸上，抹印出神像，交主人家去镇邪，也要领赏。天明再做一场法事就送坛归原位，亲友早宴后散去。

有一年夏旱不雨，各条街扎小龙上街，家家门前安有大小水桶，玩龙的来了，用水去泼，比后来在电影上看到的西双版纳泼水节更有紧张、勇猛之感。有时要到城外边去捉“旱魃”，但是几天过去，连龙王神像都抬上街游行，依然晴空烈日。儿童们成群结队上街，头上戴着柳条编的帽子，手上捧着香，唱道：“小小童儿哭哀哀，撒起秧苗无水栽，祈求皇天降大雨，黑风暴雨一齐来。天救旱，人活了，五谷不生人活倒，童子稽首拜观音，黄河大海水来了。”这样又过了几天，苍天毫无一点反应。有一个张道人出来说话了：让我在凤凰山上搭台求雨，三天求不下，架起柴火烧死我。那时我还小，不知是谁搭

台请他去的，三天要下雨。全城轰动，看张道人的法术。到了第三天太阳偏西时分，天陡然变黑。一阵雷声之后，果然下了一场大雨。这个张道人靠卖草板说唱和历书过活，这场雨是巧合还是他懂点气象经验，没有听人细谈过。

从小就在这样蒙昧、迷信、无知的岁月中生活过来，站在社会变革、科学发展的二十世纪后半期回看，世纪初一二十年的贵州何其落后。不过这样的落后在一些读书人家还是少见的。

文化生活

一个儿童在那样闭塞的半乡半城的环境中，还说得上什么文化生活？但也有几桩事对我来说留下了很深的记忆。

遵义流行川剧，我每天入塾读书，就看见大红纸写的剧报，有时随老人到东岳庙戏台去看。记得老生有王海亭，小生有谭玉桂，小丑有喻全盛。王海亭有个儿子叫小童子，也唱小生。旦角有老旦喻素兰，花旦刘玉宝，刀马旦王素兰，是男子打扮的，都是四川来的，戏唱得熟，做功也好。这几个旦角走上街时，都穿绸衣缎褂，头发垂到颈上，不是男人气概，而是忸怩的妇人姿态。川剧名艺人魏香庭由贵阳带一群小孩到遵义，叫科班。白天练功，晚上唱戏，有李天宝的小丑，蔡天鹏的花脸等。1951年我到贵州省文联时和魏香庭玩得很熟，见到过蔡天鹏、李天宝，都日渐失去科班时代的风姿。遵义有一班玩友，即是票友，唱做俱佳的有余绍堂的老生、花脸，王剑琴的老生，祝光华的袍带小丑，花月芳（余绍堂之妻）的旦角，等等。唱京剧的有文人王芝农，唱洋琴戏

的有冉玉昆等。每年有长时期的会戏，在庙子里的戏台上演。观众站在台下，不收门票。有好些中青年能全本唱出戏文，如《绛霄楼》《花仙剑》等。《小放牛》之类庸俗不堪，但在所谓下层社会中唱的人却多。柏继陶家在文昌宫放映过英国无声电影，这真是让人大开眼界。

民间的花灯、道琴、金钱板、钱杆、评书种种，我都接触，也记得一些。还有在人家屋檐下搭一个台子讲《圣谕》，这是清代的“宣传”工具，民国改为讲因果报应故事，叫“讲善书”。我们家里每年冬天，一家人围炉而坐，父亲在家时，他读《善书》，他不在家是我读，三、三、四为一句，如“大老爷，在法堂，容我细禀”之类。读完一个题后，就煮擂茶汤来宵夜。这些活动，使我后来编写演唱作品时，一回忆就有材料来到笔下。

有一个贵阳人刘湘藩，在鸭溪做厘金卡员，善赵体楷书，曾随我父亲到遵义城住我家中，用六尺宣纸写一堂《朱柏庐治家格言》，裱好悬在屋里。这篇格言给我教育，终身不忘其中一些立身处世之道。又一位卡员是幸峰五大叔，善医，曾设馆教书。我到鸭溪父亲那里去，天天都有机会听幸大叔讲读书之道，他送我的书有袁子才的《小仓山房尺牍》《东莱博议》和《酬世大全》等书，前两本看不懂，后一本是通俗读物，以后多有用处。

父亲粗识文字，他希望我兄弟二人多读书，但不要想做官，只要“站得出去”，不受地方保甲豪绅欺负就行了。那时的苛捐杂税多，读《苛政猛于虎》才深有体会。街坊摊派各种捐款，保甲欺负我家不是官绅门户，常常被苛派，有一次父亲气病了。所以我幼年时就想长大起来做个清官。这个梦想，鼓励我用功读书。

军阀混战，土匪猖獗。后来桐梓周西成执掌省政，他从“黔东之战”打李晓炎回来，老百姓摆水碗、挂镜子

在门前,表示迎接的是“明如镜,清如水”的大官。抬着铜圆的士兵,见水碗丢二、三、四个铜圆。女中学生每人发一件华丝葛的旗袍衣料,三中(男子中学)每人发三块银元。过了两三年的太平日子,这时我已十二岁,进了私立城成学校小学五年级。

那个时代

我出生于民国六年(1917年),是俄国十月革命的那一年。民国八年(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民国十二年(1923年)川东边防军混成旅长桐梓人周西成到遵义,杀了滇军的旅长罗成三,而后滇军的张汝骥、吴学显率部进驻遵义,周西成退走。民国十三年(1924年)川军熊克武、黔军犹国材旅都进驻遵义,滇军退走。民国十五年(1926年)周西成任贵州省长,开始修马路。我们听过老一辈讲述一些战乱纷争的小故事。战乱过程中,土匪在城外骚乱。我家住在新城外,也曾几次避乱暂时迁到城里外公家去住过。周西成执政时期,土匪基本肃清。那个时代,对省外世界和国外世界,没有知识。但是,我们已在用美孚煤油或英国壳牌煤油。每次买铁皮桶一桶,还用日本造的牙粉和香皂,香皂叫洋胰子。城中心商业区晚上燃煤气灯,也有放留声机的。外省来的谌明道、刘信斋两家卖西药,湖南宝庆人在乡下烧炭进城出售,外省商贩也有。遵义有钱人家对穿与吃都讲究,绫罗绸缎和外国进口的阴丹士林布、白市布很行销。周西成由赤水起程到贵阳接任省长,遵义商界沿街扎牌坊,都是用的绫罗和各种色调的绢,极为富丽堂皇,以后若干年没有见到这样的排场了。

在新城北门外有一座石牌坊,书一副对子,中间有

“五百年后，云贵胜江南”，不知为什么这样大的口气，没有料想到历史发展到二十世纪末，一切情况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高小、中学时期

民国二十年(1931年)，我十三岁，遵义新城公所创办私立城成学校于新城的桃源山上。校董有管理公所的老商人李作霖、杨静澄。学校校长刘伯庄先生，成都师范毕业，回遵义后办过小学，任过百艺厂厂长(民初成立，被水冲垮)。学校聘有几个贵州大学学生做教师。我十三岁该读省立第三中学，父亲为慕伯庄师实干家之名，要我从私馆到城成学校高一班去。

班主任赵宗典志常先生教白话文、英语和三民主义，组织学生讲演会。赵先生要我做班上的级长和讲演会会长。班上的一、二名是李枝琨和田庆昌轮流得的，我的体育、音乐和美术分数低于他两个，只好稳坐第三名。班上不到三十人，活到二十一世纪的只有周永桃、幸必达和我，周长我一岁，幸小我五岁。

伯庄校长善书法，教师都是他的晚辈，只有志常先生他叫三弟。教我们写字，初学赵楷。平时走在教室外听教师上课，他发现教错了字就走进教室去纠正，使教师难堪，因此备课认真。又常在晨操时纠正学生的姿势。每天教师在学校内用午餐，厨师叫朱二哥，校长亲自管膳食，桌上几荤几素，安排得十分讲究。

志常先生之父赵恺乃康先生，是前清拔贡，研究许郑之学，在中学教书，任《续遵义府志》总纂。为学校写一副楹联：“正其衣冠，尊其瞻视，行为士表，学为儒宗。”这也是校训。